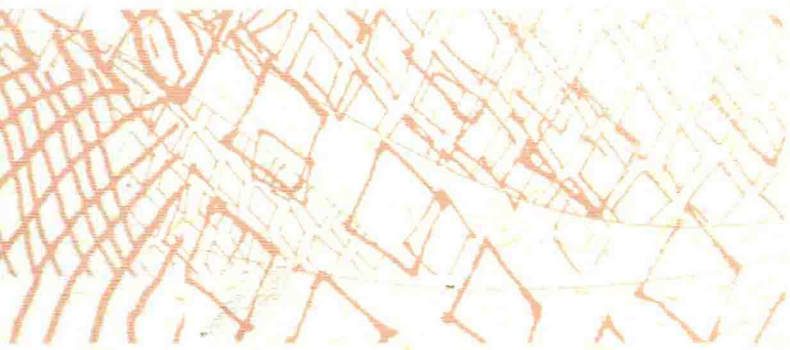


河南省重点学科论丛

HENANSHENG ZHONGDIAN XUEKE LUNCONG

元代儒学 教化研究

张延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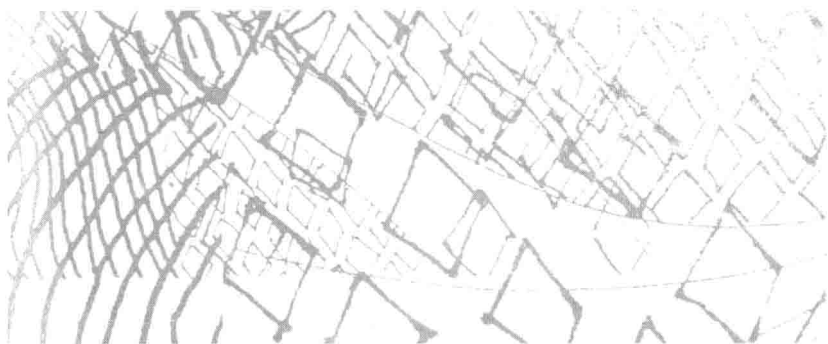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河南省重点学科论丛

HENANSHENG ZHONGDIAN XUEKE LUNCONG

元代儒学 教化研究

张延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代儒学教化研究 / 张延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161 - 5389 - 5

I. ①元… II. ①张… III. ①儒学—教育—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B222.05②G52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8038 号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郑州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
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北生		
副主任	蒋丽珠	盛 宾	陈国维
成 员	于启新	杜志强	陈光磊
	贺常平	李玉向	

追寻学科建设的教育理论与发展研究

(代总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正在由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诉求。学科是学术的土壤，是创新的源泉，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而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把同类知识进行系统化的集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需要充分发挥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

教育学原理是研究教育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求教育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教育学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揭示教育的规律。即揭示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外部诸事物之间的本质性联系，以及教育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阐明教育的各种规律。二是科学地解释教育问题。即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提供超越日常习俗认识 and 传统理论认识的新解释，促进教育知识的增长。三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即通过对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教育问题的解释，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进而成为沟通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桥梁。教育基本理论是教育的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对教育实践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因此，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中的基础学科，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为研究各级各类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它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教育学原理学科是郑州师范学院的传统学科，也是学校的优

势学科。2010年,本学科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通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2012年10月被评为河南省第八批重点学科。以王北生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本学科研究团队,立足中原经济区建设,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性文化转型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借助于中原独具的区位优势,通过对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的透析,引领河南省基础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同时,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研究的长足发展,对于支撑师范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加强教师专业发展,针对教师教育专业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此,学校确定的教育学原理学科点的建设目标是:立足于教育在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先导作用进行研究和探索,在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教师教育研究、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学四个学科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和实践,形成明显的优势和特色。

1. 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通过对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的透析,引领河南省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方向。该方向的特色是注重传统教育理论的实践反思,关注教育中基本问题的研究;注重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注重新课程改革中学习策略与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注重学校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注重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塑造的研究;注重人的社会性发展研究。

2.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以教育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以和谐校园建设为切入点,以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理论及专业技能培养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宏观、中观、微观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教育资源整体优化为研究路线,探讨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发展的对策和改革路径。通过对全省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实现郑州市基础教育的整体提升,引领和示范河南的基础教育发展。

3. 教师教育研究

以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导向,立足于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以教师培养与培训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进行教师教育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师培养与培训模式的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教师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师范生教育技能研究等内容。

4. 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提高特殊需要人群素质、提高教育水平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特殊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形成河南省特殊教育研究的高地,指导河南省特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本学科的特色是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人才为主,兼顾康复人才和残疾人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辅,开创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进行上述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借助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建设,在研究成果方面提出注重理论前沿、注重学科交叉、注重实践效果的基本要求。拟出版一批教育学原理学科领域的学术专著和规划教材,形成该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志性科学研究成果。

首批出版的重点学科论著,是郑州师范学院近三年来本学科的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经重点学科的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后进一步完善的学术专著。其学术前瞻性主要体现在吸收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的新成果,部分研究成果表现出研究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其教育实践与前沿研究成果结合的方法为学习者提供了探索新问题的路径。其中有对教育投资理论问题的分析;有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性探索;有对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的挖掘;有对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反思;还有对特殊教育师资资质标准的研究等。他们不仅关注教育学基本资料的建设和积累,强调教育实践之于教育理论的重要意义,重视教育理论之于教育实践的服务功能与教育理论审视教育实践的本质使命,而且还积

4 元代儒学教化研究

极参与教育学术规范的建立，努力拓展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视域。

根据重点学科的研究进程和各方向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学科论丛还将陆续出版一批新的论著，如教育与人的发展的研究、师范生实践技能标准研究、教师职业化研究等。同时出版与本学科所属专业的规划教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指南。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观念在教育发展中具有先导作用。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所合格的大学。我们期望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建设，能够实现区域基础教育的整体提升，引领和示范河南的基础教育发展，形成相对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支撑师范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加强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技能培养。殷切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参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产生一批有一定研究水平的成果。能够有效地引导河南省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整体提升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在此，我们真诚的将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部分教师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恳请得到各位专家同仁的批评与指正。

郑州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

论丛编辑委员会

2014年10月26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3)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5)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14)
第四节 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	(16)
第五节 元代教化概述	(34)
第六节 本书的基本框架	(37)
第二章 元代社会状况与理学教化主导地位的确立	(39)
第一节 元代社会特色与儒士的实际社会地位	(40)
第二节 元代理学教化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	(50)
第三章 元代儒学教化的政治制度层面	(72)
第一节 元代法律与教化	(72)
第二节 元代循吏与教化	(88)
第四章 元代儒学教化的学校层面	(108)
第一节 元代关于学校与教化关系的认识及 学校的建设	(108)

2 元代儒学教化研究

第二节 元代官学与教化	(116)
第三节 元代书院与儒学教化	(151)
第四节 元代其他私学的教化实施	(171)
第五章 元代儒学教化的社会基层组织与文化层面	(192)
第一节 元代宗族制度与教化	(192)
第二节 元代“社”制与教化	(221)
第三节 元代戏剧与教化	(231)
第六章 元代儒学教化的“主体”与“客体” 分析及个案研究	(253)
第一节 元代社会教化的“主客体”分析	(253)
第二节 元代儒学教化典型个案——江西金溪县的 儒学教化	(294)
结 语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21)
后 记	(339)

第一章

导 论

葛兆光曾经指出：“思想史常常把只是思想家的思想悬置起来，成为分析的文本，这当然是由于思想所发生的土壤和思想所进入的生活业已消失，但也常常是因为很多思想家并不注意思想的实现而只注重思想的提出，这使得思想史无法确定这一思想对真正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① 思想史是如此，教育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教育史研究者常常只把历史上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对这种教育思想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环境的意义却常常轻描淡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是由于“文本”是现成的，而在文本指导下的“行动”及其影响则是在另外的“文本”上或许有记载，需要研究者重新进行找寻并梳理，这是一种繁重的然而其结果与意义尚不确定的劳动。

然而，用葛兆光的话来观照宋元理学产生之后的中国社会，则恐有以偏概全之嫌。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两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义理之学代替两汉以来的章句之学，而探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替代考据音韵训诂，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要目标。从此，中国传统思想进入到了理学的时代。相比于前代学者，理学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2页。

都极为重视教育^①，他们在探究儒家经典中的义理的同时，大都设坛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然而，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在学校教学中传播理学思想，更注意通过刻印书籍、表彰节义等手段来向社会推广理学思想，进行社会教化，因而自两宋以后，中国传统教育以及中国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余英时曾说：“儒学在中国传统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②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现象在两宋及其以后的明清更为明显。对于宋元明清的思想史研究，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笔者不能拾人牙慧，或者狗尾续貂。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来看，则会发现很多问题，因为教化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对这种传播活动从“过程”及“效应”上进行探讨，或许能够有新的发现。上述余英时所提到的事实对于我们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教化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又是怎样成为这样一种事实的，就需要认真探讨一番。特别是在元代这样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朝代里，中国传统儒学教化的处境怎样，发展流变又是怎样，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也就是怎样成为上述“事实”的，正是我们所密切关注和想要解决的。

① 此所言之“教育”，无疑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即对于普通民众的“教化”。儒家本有“淑世情怀”，此种精神至宋儒则更为明显，如钱穆就认为“自宋以下的学术，一改南北朝、隋、唐以来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见《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93页。蒙文通亦注意到，宋儒与汉儒的一大不同，即其谆谆于基层社会教养之道，“源于理学理论之必然”，更将理学与“教化”直接联系起来。见《宋明之社会设计》，《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148页。

②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问题与展望》，《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儒学在宋朝及其以后的新形态——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产生于北宋，成熟于南宋，在元朝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明清，其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不可避免地产生分化与变异；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然而，无论是一般的研究专著，还是通史性质的（包括思想史、教育史等）著作，都把“宋明理学”当作“理学”来阐释，而忽略宋、明之间的元朝的理学，从而造成详于宋、明，而对元朝匆匆略过的现象。确实，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元朝理学确实没有大家，即使是号称“元朝一人”的许衡，其理学造诣仅仅在“四书”与“小学”，而与之相提并论的吴澄，也无多少理论建树。而且从另一方面，即宏大叙事的角度看，元代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不得志”的时期，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主要指理学家派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政治所起的作用，相对于其他朝代，要小得多。一再被人们引用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虽有夸大之处，并且出处可疑^①，但以此形容生

① 现今接受甚众的元朝“十等人”制度，有两个出处，一为谢枋得《叠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二之《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见于郑思肖《铁函心史》（广智书局1905年版，第140页），二者所言之序有所不同，且前者所言之前尚有“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字样，可见只是传闻。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6页）、颜天佑《元杂剧所反映之元代社会》（台北化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08页）、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见《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75—376页）、黄清达《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北有坤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79—80页）等均有所辨析，可参考。

活在依靠军事侵略建立政权，直到百年后从中原退出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野蛮与粗俗色彩的政权下的儒家知识分子，确有些许合理因素。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认为在理学发展史上，元朝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朝代。事实上，元代理学，虽然在理论构建上没有取得大的发展，但在政治混乱的时期，却能够涓流点滴而成沧溟之水，拳石渐崇而有泰华之岑，使理学学说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逐渐普及、渗透到民间，成为明朝以后的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这样从延续、占据统治地位到逐渐普及、渗透到民间的过程进行一番考察，也许还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宋元学案》曾言：“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尚未替。上虽贱之，下自趋之。是则洛闽之沾溉者宏也。如萧勤斋、同榘庵辈，其亦许刘之徒乎？”^① 这话虽然稍嫌偏激，“上虽贱之”也未必尽然属实，但确实指出了元代“学术未替”——理学继续发展并且“下自趋之”，最终使“洛闽之沾溉者宏”——影响进一步扩大的事实。钱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受制于异族的时间分为三期，而元朝为其一焉：“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茎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② 钱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此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异族统治时期，故其说不无可议之处；然而其比喻却仍可说明一些问题：严冬时期，不正是根茎潜滋暗长、向着土壤深处伸展的时候吗？

福柯的名言“人们不用在明显的东西下面寻找另一话语的悄悄絮语，而是应该指出，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

①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九十五《萧同学案》，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清道光道州何氏刻本校刊，第1123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页。

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①，也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我们探讨元代理学如何成为占据政治及民间的“任何其他一种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的信心。如果摆脱宏大叙事的局限，对元代的现存相关文献进行一番梳理，将目光转移到民间、底层，我们就会发现，元朝，其实是理学一步步向民间下沉并渗透的朝代，亦即理学作为“大传统”进入民间“小传统”^②的关键时代。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那些存在于理学家及其传人头脑中、写在书本上的理学思想，在元朝这样的朝代里，是怎样传播到民间（下沉），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渗透），成为其行为规范的。这样的过程，笔者称之为“教化”或“儒学教化”。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需要笔者将整个朝代的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状况纳入研究视域，对之作整体考察；同时，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研究者运用细致笔触，注意到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将“面”与“点”恰当结合起来，从而做到既抓“大”又撮“小”，既务“虚”又坐“实”，展现出元代教化的生动场景与基本特质。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现将本书所用的几个主要概念进行如下的界定：

①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8—29 页。

② 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观点来解释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某些问题，成果甚多，具体情况可参见翁频《近二十年国内外大小传统学说研究述论》，《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该文侧重于对作为精英、上层的儒学（理学，所谓“大传统”）渗入于民间（所谓“小传统”），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亦即所谓“教化”）的途径及方式进行研究。

一 元代

一般研究中国某朝代历史、政治与文化的著作，似乎不存在这样的对时间段进行划分的问题。因为在其他朝代，其起止的时间均比较明确，一般从建立国号开始，到其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或杀死结束。如宋朝，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而夺得皇位，改国号为“宋”，建都于汴；至1127年，高宗迁都于临安，最终至1279年，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溺死于厓山海面，虽有北宋、南宋之分，但研究宋朝，就是在这319年间做文章；跨出这个时间段，就不是宋朝了。而元朝，则要复杂一些。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称“成吉思汗”，将自己所管辖的地域号称“大蒙古国”^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公元1260年，其嫡孙忽必烈即汗位，仿效中原王朝，建元“中统”，四年后又改元至元；又过了十一年，至元八年十一月（1271年），才根据《易经》“大哉乾元”而建国号为“大元”。学界一般认为，元朝由此建立。但之前，作为一个政权，它已经存在了65年。从忽必烈定国号起，过了98年，至1368年闰七月丙寅日（闰七月二十八日，公历9月11日）夜半，元顺帝率其妃子、太子及一些官员，从大都撤出，逃往岭北；四日后的八月庚午日（初二日，公历9月14日），明军入城，元朝形式上灭亡。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政权，它仍在漠北的广大区域中存在着将近百年，其政权之名仍为“元”。故史家一般把从成吉思汗开始建立政权到忽必烈之前的这段时间称为“大蒙古国”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元朝”，是指从忽必烈定国号到元顺帝退出中原

① 历史学家一般把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之间的65年称为“大蒙古国”时期，萧启庆对此有专门讨论，详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77页。

重返漠北这一段时间，而把之后的“元”称为“北元”^①。当然，也有从至元十五年（1279）元灭南宋起才称为“元朝”的情形。如此复杂的情况，使本书不得不在时间上进行界定：上取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之1260年，下止于元顺帝北亡之1368年，亦即元朝正式开始作为一个中原朝代及退出中土的这段时间。主要资料的选取，均以此期间为限。之前之后或有所及，然非主体。

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的问题。元朝结束了自五代以来北、南中国近五百年的分立对峙局面，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大”是元朝的主要特征，恰如明初所修《元史》言：“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②元代后期官拜翰林直学士的诗人周伯琦（1298—1369）曾扈从顺帝夏巡上都，作“上京纪行诗”组诗，其中之《野狐岭》中吟咏道：“休养嘉承平，禹迹迈古先。汉唐所羁縻，今则同中原。大哉舆地图，垂创何其艰。”^③这种“疆域广大”观念在当时甚至成为一种“常识”。元朝后期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类书《纂图增修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即言：“际天薄海，莫非王土。开辟以来，提封之广，未有如今日之盛。”^④

① 此说具体可见达力扎布《北元史研究三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总25期）。

②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③ （元）周伯琦：《扈从集》，四库全书本，不分卷。

④ （元）佚名刻：《纂图增修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癸集卷上“舆地类”之“大元皇帝”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33页。